

古代诗词典藏本

袁行霈题

主 编 袁行霈

副主编 刘跃进

李白诗选

钱志熙 刘青海 ◆ 撰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古代诗词典藏本

袁行霈题

主 编 袁行霈

副主编 刘跃进

李白诗选

钱志熙 刘青海 ◆ 撰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白诗选/钱志熙,刘青海撰.—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古代诗词典藏本)

ISBN 978-7-100-12172-9

I.①李… II.①钱…②刘… III.①唐诗—选集  
IV.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372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李白诗选

(古代诗词典藏本)

钱志熙 刘青海 撰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172-9

---

2016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½

定价:28.00 元

## 走出学术象牙塔

刘跃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较而言，我们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但精品甚少。很多学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认为体现不出研究水平；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也很难得到同行认可。这样一种偏见，必须改变。

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汉代对于经典的注释、唐代对于古注的疏证以及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历代经典的重新阐释，其出发点多是普及经典知识。现代学术研究又何尝不该如此？即以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六十多年前刚刚筹划建立文学所的时候，最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近来翻阅《王伯祥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郑振铎、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划《诗经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的工作，印象深刻。每一部书的编纂，从篇目的确定，到注释的推敲，都经过反复打磨。然后内部油印，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广泛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经过这样几个回合，才最后定稿，公开出版。这样的书，阐释经典，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多数印行在数

十万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前辈学者的工作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我们必须对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说易行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没有普及，何来提高？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普及。现在，不少学者宁愿躲进象牙塔中做专精研究，也不愿意做点文化普及工作。这种观念值得商榷。毫无疑问，专精研究当然应当鼓励，给予尊重，这个社会也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研究者，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这道理不言自明。但同时，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知。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学术研究的本质也要求必须关注社会、依靠群众。如果我们的学术脱离人民群众，那就成了无根之木，难免凋零枯索的命运。这道理不言而喻。

启示之二，做好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首先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康德《逻辑学讲义·导论》说过：“学术的讲述是通俗讲述的基础。因为只有能够彻底讲述某物的

人，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它。”这段话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提高在前，普及在后。普及不是随意发挥，一定是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才有价值。真正的普及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好的普及工作者，必须是在他这个领域掌握了丰富知识的研究者。没有深入的研究，哪来生动的普及？王伯祥、余冠英、钱锺书等人的学术普及工作就是成功的典范。对学者而言，深入易，浅出难。浅出所以难，是对作者要求高，他必须真正读懂经典作品，才不至于把经念歪。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专注于某一学术领域，遇到不懂的地方，偷懒的办法就是绕过去，而要讲给大众听，就无法藏拙。因此，做好普及工作，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积学储宝、研阅穷照。只有这样，我们的普及工作才会更有实效，也才会更有意义。

启示之三，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一个不知本来的民族，是绝对没有未来的希望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重要。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物质文化可以全球化，而精神文化却有其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文学研究工作者，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将会永久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上述几点启示来看，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这套“古

代诗词典藏本”，恰逢其时，其意义自不必多说。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他们以“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为追求，其选家皆术有专攻，在其所选评方面具有相当的专精研究与学术影响，从而保证了选本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正是由于每位选注者的研究领域、研究特点不同，因此“古代诗词典藏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强求整套丛书风格整齐划一，而允许一选本有一选本之个性特色。这里仅举数例：李山教授的《诗经选》，仿佛带领读者做了一次重回“诗经世界”的新旅——重新审读其字句、篇章，重新考订其创作年代，勾勒其礼乐背景，体味其文化意蕴，欣赏其风雅艺术，考察其歌唱方式……《王维诗选》的作者王志清教授认为，王维诗乃诗之哲学，亦可谓哲学之诗。故其选评，敏于感悟，精于赏玩；其评赏文字，巧于切入，工于辞采。《李清照诗词选》的作者陈祖美先生，在历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贴近窥见了李清照的种种内心隐秘，从而细绎出易安的十余种“心事”——幼年失恃、党争株连、婕妤之叹，以及终生无嗣的庄姜之悲等等，提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独到见解。

无须赘言，只这几本书的简略介绍，即已充分显示出选注者的学术个性。在大的统一的原则下，保留各个选本自己独特的面孔，这一点，近于文学所编写经典读本的传统。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就特别强调自己“注”的特色，而与其他选本略有不同。希望这种不拘一格、力避匠气的文风与学风，贯彻丛书始终，从而涌现出更多的既拥有学术品位又文采斐然，既不乏前沿理论、自出己见又深入浅出的精

品选本。

丛书付梓在即，编者希望我就上述特色发表感想，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理解，这种信任让我感动。确实，好书好序，相得益彰。如果翻开一部新书，上来就是一篇乏味的序言，就好像刚出门，便遇上障碍物，诚可谓“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叫人眉蹙。顾炎武《日知录》早就告诫：“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贸然作序，对读者可能会是一种冒犯。但我想，好书确实需要介绍，好意也要有所表达。我真诚地呼吁我们的同行，在努力攀登学术高峰的同时，不要忘记为社会尽些心力，为国家文化建设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六十年前，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经典读本，以著者自己研究为基础，广泛借鉴吸收前人成果，取得空前成就，影响至今。我们相信，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这套“古代诗词典藏本”，也一定能在学术普及工作方面推陈出新，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2014年5月30日

草于京城爱吾庐

## 导 言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进入全面成熟的时期，而盛唐尤其可称诗歌的黄金时代，后人或称其为“诗国高潮”。李白与杜甫正是在这个“诗国高潮”中将诗歌艺术推向极致，以各自的方式、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做出巨大的创新，而成为后代诗人的立法者。千余年来，历代诗人不断地摩李杜之垒，斩将搴旗，演绎着壮观的诗史进程，但迄今仍无在整体成就上超越李杜的诗人。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清赵翼《论诗》），只是表达了后代诗人力求突破的愿望，并非接受史上的真实情况。相反，在诗性精神失落、诗歌艺术失范的今天，重新学习李杜诗篇，领略其非凡的魅力，甚至破解他们创造艺术经典的奥秘，似乎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具必要性。当然，拂拭去落在他们身上的各种尘埃，显其真美，更是我们的良好愿望。这一部李白诗歌的选评，就是这种愿望的一个尝试。

### 一

李白（701—762），生于武周长安元年，卒于代宗宝应元年。他的一生，经历了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

宗五朝，目睹或亲历了唐对武周的拨乱反正、玄宗开元之治、天宝政治紊乱、安史之乱及其平定等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的重要事件与变化，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决定李白人生命运的外部条件。但对于这个胸怀奇志而又用世不酬的天才诗人来说，除了天宝二、三年间（743—744）被召入宫任翰林学士；至德元载（756）为时任江陵大都督、擅自起兵的永王璘辟为僚佐这样两次比较重要的介入高层政治的经历外，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闲居读书、隐居求仙、漫游、任侠、干谒这些生活状态中度过的。其中隐居与漫游是他两种主要的生活方式。殷璠《河岳英灵集》说“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sup>①</sup>，可见李白曾有过较长时间的隐居。他自己在《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一诗中也说：“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蓬壶虽邈绝，鸾鹤心悠然。”这是他三十岁左右的诗<sup>②</sup>，应该是指他早年读书大匡山、栖游峨眉以及出川后就亲许家、隐居安陆的一段生活。所以，在当时一些人的印象中，李白是在隐逸的状态下被玄宗召入京中的，如魏颢《李翰林集序》就说：“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sup>③</sup>。”他后来定居山东任城时，也曾与孔巢父等共为栖隐，时称“竹溪六逸”。安史乱中也曾隐居庐、霍两山。他平生漫游各地，也常同时为山林栖隐之事。

① 见《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3页。

② 见詹锼等《李太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册，第1880页。

③ 见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册，第1449页。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一文中对他晚年（安史乱后）这种漫游兼栖隐的生活情形，有比较清楚的描述：“俄属戎马生郊，远身海上，往来于斗牛之分，优游没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境，终年不移。长江远山，一泉一石，无往而不自得也。晚岁渡牛渚矶，至姑熟，悦谢家青山，有终焉之志。盘桓利居，竟卒于此<sup>①</sup>。”或许可以说，栖隐、漫游、流寓间互而作是李白生活的一种常态。他的一生是比较动荡的，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漂泊无定。这有他主观上性格的原因，也有客观形势的造成。我们读他的诗集，首先要了解他这种生活状态。

盛唐仍然是一个诗的时代，后世异常重视传记与事实的文献观念，这时候显然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无论是李白本人还是与他时代接近的若干崇拜者，都没有自觉地建立诗人传记的观念。李白也继承了陶渊明等古代诗人的自述传统，写作了若干自述性的诗篇，如《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其创作目的仍然只在怀旧与抒情，并不着意于建立自己的传记。较早记载李白的李阳冰、魏颢之文，都重在评其文章，传其神采。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过于简略，其中“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及“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数条，最具传记史料的价值，似为他家所未及。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多为评论之辞，但

<sup>①</sup> 见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册，第1465页。

其中记载李白曾投书裴敬叔祖裴将军，希望从其学剑，文宗皇帝时命翰林学士为李白歌诗、裴将军剑、张旭草书作三绝赞，这几条具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范传正墓碑稍近翔实，为后来多家传记、年谱所本，但总体上仍偏于概约。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李白生平还有许多无法清晰的事实。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一一系以年月与本事，虽非不可为，却困难重重。因此，下面的文字，只能介绍其生平经历之大概，并且尽量侧重于其人生经历中思想与精神方面的发展历史。

李白是蜀中广安郡彰明县人。据李阳冰、魏颢二序，为凉武昭王九世孙，曾经蝉联簪组，中叶沦为庶民，并曾以非罪窜逐条支（中亚碎叶），曾改换姓氏。其父回到内地，择居彰明，指李树而生太白。这应该是李白自己的叙述，虽然其现存诗文中没有说到这些家世的情况。或说太白也生于中亚，五岁时随父归居内地。其父应该是一个有文化的富商，或为一般的富人。据《彰明逸事》等地方文献记载，李白年轻时曾短时为县中小吏。虽然他以凉武昭王后裔自居，并且与当代李姓人物如李阳冰、李云等常叙族谊，但考察其基本的身世，实为边地寒素之士，门第与其蜀中前辈陈子昂接近；但陈子昂家族属地方豪族，李白或许更低一点。唐玄宗召见他时说：“卿为布衣，名为朕知<sup>①</sup>。”可知李白是典型的布衣寒素之士。在当代诗人中，不但不及出于宰相门第的岑参，而且比杜甫、王维都要低。但是李、杜、王、孟、高（适）等人，基本上都是属于没

① 李阳冰《草堂集序》，见《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下册，第1446页。

有政治背景的寒庶才能之士这个阶层。令人纳闷的是，从武周时代以来的文学之士，大体上都要走进士科考试的路径。而李白不但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从其生平自叙中也看不到一点参加科考的打算。这从表面上看来，与他自述中所表达的从小就抱负奇伟的政治理想十分矛盾，却正是他怀抱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关于李白的政治理想，陈贻焮先生曾有过精彩的论述：李白有多种梦想，侠客、高士、圣贤、神仙。但他最主要的理想，是为帝王辅佐，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再遂其隐逸出尘、成为高士甚至神仙的浪漫理想。“可见李白是企图将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和消极出世的老庄思想、隐逸态度结合起来，以前者为用，以后者为体，使自己成为如嵇康所说的‘并介之人’，由隐而仕而终归于隐，以退为进而急流勇退，以避免偏执一端之弊，而并获‘兼济’‘独善’两者之利<sup>①</sup>。”陈先生认为，李白这种人生理想虽然在表现上有些特殊，但是有它的现实成因。隋唐之际，六朝士族制度崩溃，虽然固有的门第观念还在社会中存在，但从唐初以来，不少寒素阶层的士人，完全依靠个人才能走上政治舞台，建功立业，甚至位至将相。而当时通过隐逸甚至学道求仙等行为而获致名声，为最高统治者所关注、征召者，也不乏其人。这正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及其对政治途径的个人设计的现实依据。李白的这种人生理想，不仅有现实的成因，而且还有深远的文

① 参见陈贻焮《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载其《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180页。

化传统的作用，至少东晋以来追求自然与名教合一的人格理想的形成，可以看成李白精神的历史渊源。当然，可能还有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嗜酒，志不拘检，且为神仙栖逸之士，也使他不能成为兢兢业业、俯首就范于科举规范的普通士人。何况初盛之际的科举事业并不发达，较少通过科举入仕而致身台鼎者。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白的文学，完全没有受科举文章的影响，能够完全服从其个人的文学理想，走了复古深造的道路，成就其毫无凡近之思的飘逸入神的文心与诗境。

正是这种奇伟的政治理想与特殊的追求仕进方式，造成了李白独特的人生轨迹，也决定了其不同于常人的生存状态。李白在幼、少年接受了比较优渥的文化教育与文学修习后，到青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在邻郡漫游，隐居大匡山读书，并且往来旁郡，游历江油、剑阁等地，十八岁时游梓州，从赵蕤学纵横术。赵蕤亦是节士，任侠任气，善为纵横学，著有《长短经》，因为开元中召之不赴，得到“赵征君”称号。他可以说是对李白影响比较大的人物，李白的任侠、好谈纵横之言，与其早年这一学习经历有关。李白二十一岁时，曾赴成都谒见时任益州长史的苏颋<sup>①</sup>。玄宗开元十二年（724），李白二十四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韩荆州书》），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蜀地。这似乎是唐宋时代诸多蜀地英才的共同命运。蜀道难行，蜀地偏远，他们离开故乡后，常常很难再回去。但思乡之念，从开始离家的那一刻就产生了，一首《峨眉山月歌》，牵动

① 参郁贤皓《李白出川前后事迹考辨》，《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了千古游子的乡思。但故乡终究越来越远，远得望不见它的影子，诗人只有借江水寄托无限的乡思：“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远荆门送别》）于是，思乡成了太白终生难消的情愫，或许这是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深痛。若干年后，当李白离开长安之后，另一种重要的终生情结，即忆念长安、思念君国的情怀，同样激烈而又持久。与上述两种情感相联系的，则是学者称为“客寓意识”的一种流寓漂泊的生活体验。上述情怀与体验，构成李白诗歌的基本情调。可以说，李白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以及求仙学道，造成其动荡不定的生活，而思乡怀都、思念亲友等等，又构成他人生的诸多执着与系恋。这种系恋，尤其是政治上的理想追求，甚至达到了刻舟求剑式的固执与不智。外在生活的不断变化、动荡不定，与内心的诸多情感执着，构成李白式的动与静的矛盾统一关系。

出川后的李白，在荆襄、洞庭一带漫游，后来又来到金陵。至二十七岁时方才就婚于故相许圉师家，遂定居于湖北安陆，将近十载。但这期间，他仍保持了蜀中时已经形成的不断离家出游、隐居山林的习惯。他轻财好施，广事交游，结识文人、侠士、羽客、缙流，其中有司马承祯、李邕、孟浩然等重要人物。孟子所说的友一国之士、友天下之士、尚友古人，李白都做到了，而且是比较自觉、积极地去做。李白以坦荡的胸怀结交当世人物，并且在诗歌中表现他们。所以，与杜甫一样，李白诗歌也塑造了开元、天宝时代士、俗各种人物的群像。并且李白常常在这些人物身上投射了他自己的豪放性格与奇调作风，尤其是对那

些隐逸山林、轻视轩冕的方外之士，如孟浩然、元丹丘等人，李白常常无保留地表达赞慕之情。这其中洋溢着开元时代寒素士人特有的一种浪漫情调，深受六朝调达、闲逸风气的影响，如李白《赠孟浩然》诗中所表现的遗荣任真情调；同样，其《题元丹丘山居》中也表现了这种情调：“故人栖东山，自爱丘壑美。青春卧空林，白日犹不起。松风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羡君无纷喧，高枕碧霞里。”我们在王维、孟浩然、李颀等人的诗歌中，也看到了类似的情调。但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却比这些诗人要激扬得多。我们有理由相信，李白大概在少年时代，就已萌发奇伟的政治理想，但其理想的真正明确化，应该是在开元中期寄迹安陆的时候。大约作于开元十五年隐居安陆寿山时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sup>①</sup>，是李白早年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的完整表达。在这篇壮浪恣肆、寓言山灵的文字中，李白自称逸人，“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他在山林中“虬蟠龟息”，养真藏身，欲将“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人天之渺茫”，亦即一种超越一切、达到绝对之自由的人生理想。但是，最终又拟放弃这种完全属于独善形式的天真理想，决定投身政治，“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正是这样，独善与兼济，做巢由与做伊尹，就像两种基本旋律一样在李白的人生中交响着，并且是同

① 参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样的宏大奇特。出现于李白诗中的姜尚、鲁仲连、张良、谢安，则是李白理想中完美结合了这两种人生理想的古代人物。李白诗歌中对历史人物的成功塑造，正是根源于他的这种精神气质，并且同样是富于奇特效果的。总之，李白诗歌的浪漫情调、奇伟飘逸或豪迈激越形象的造成，都来自于他的上述人生理想。只有深入了解并同情、理解李白这些鲜活的人生体验，领略他的精神世界，才能接近他的诗歌精神。

但是在漫游、干谒、隐逸、求道甚至行侠等多种生活经历的变奏中，李白精神世界中的现实内容也在增加着。他的具体生活情形，比如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以及现实中的交际真相，我们很难知道，他自己也很少表现。但是他的现实感的增强，对社会与政治复杂性认识的加深，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大约在开元二十八年前后，李白因原配许夫人去世，与“山东一妇人合”（魏颢《李翰林集序》），移居东鲁<sup>①</sup>，此时李白四十岁。其间仍不断漫游梁宋等地，进入洛阳，并北游太原。最后在天宝二年受玄宗征召，入长安宫廷，为翰林学士。长安经历，无疑是促使李白现实精神成熟的最重要因素。关于李白的长安经历，在具体的历史事实方面，就如李白生平的其他事实一样，有许多我们今天不能完全清楚的地方。李白在天宝初，受玄宗之召入京，并曾任职于翰林院，草诏诰及密书，参与或者至少是与闻军国大事。但其在翰林院，像他在安陆等地一样，颇遭才忌，这一点，早期的几种李白传记都持同样

<sup>①</sup> 参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51等页。